



从《三国志·吴主传》探讨陈、裴 记载的异同

**A Study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Record of Chen and
Pei in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Biography of the Lord of Wu***

黄紫晴

OOI ZI QING

15ALB02415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9

从《三国志·吴主传》探讨陈、裴 记载的异同

**A Study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Record of Chen and
Pei in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Biography of the Lord of Wu***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黄紫晴 OOI ZI QING

学号：15ALB02415

日期：2019 年 3 月 20 日

论文名称：从《三国志·吴主传》探讨陈、裴记载的异同

学生姓名：黄紫晴

指导教师：余曆雄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文以《吴主传》中的陈、裴记载为中心，探讨两者记载的异同中对孙权历史形象的刻画。本文第一章为绪论，简介论文的研究动机、前人研究成果和论文构思，自从史学脱离了经学的附属地位后，展开了与经注不同的注释方式。其次“三国”涉及的议题极为广泛、有历史、文学、思想和等范围，本文以历史角度论三国的前人研究成果为主。本文在论述孙权之时，以表列出陈、裴记载的异同，从中再深论如何影响后人及孙权的历史形象。虽然《三国志》源自于晋朝，但三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晋朝以后极为广泛，后人甚至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对三国的历史人物充满着想象。本文为了避开小说的虚构人物，因此在次章简介《吴主传》在《三国志》到《三国志注》的变化，探讨两者作书动机及内容、并研究两者对孙权的描述。首先陈寿撰《吴主传》所用之字不如《武帝传》和《先主传》，其次裴松之注《吴主传》的内容带出更详细的孙权形象。

次章分析孙权前中期时两大战役，即合肥之战和夷陵之战。从陈和裴的记载下，探索二者对两场战役记载的异同之处，异为陈和裴记载不同或陈无记载但裴收入的内容；同为裴在陈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内容。合肥之战约六年期间，陈、裴分别记载了不同的内容，如刘表军力、曹操退兵濡须和孙权被张辽袭击。夷陵之战主要分析陈、裴对孙权遣使者出使魏、蜀的记载。

次章分析孙权中晚期时发生的两大事情，一航海辽东，二两宫之争。本文比较陈、裴对前者的记载后，得出孙权与高句丽往来的记录源于裴注，同时本文认为后人对前者赋予贬义的评价源于裴松之的注。后者引起陈寿与裴松之不同的评价，陈评价孙权时褒贬皆有，其最为批评的是孙权对二宫之争的处理方式，但裴并不认同。本文搜集了《吴主传》中所见的裴松之自述或借引他人对孙权的评价，从中探讨其是完全反对陈寿的评价又或有认同之处。最后笔者认为“三国”的研究除了人物、史学，尚可涉及文学、思想和等范围。

【关键词】 孙权、《三国志》、陈寿、裴松之

致谢

首先，笔者感谢余老师给予有利的指导。即便笔者听过很多建议，皆认为“三国”的命题已无研究价值，但在余老师的帮助下成功将研究范围从《三国志》缩成《三国志·吴主传》，谢谢余老师不嫌弃笔者的脑洞。此外余老师在这两个学期中，不断提供笔者各类有用的书籍及期刊，在老师的督促下最终顺利完成这份论文。余老师不仅在毕业论文上给予有利的帮助，同时也为笔者提供了未来的方向，在此真诚致谢。

其次，笔者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与支持。家人给了笔者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完成此论文，在关心的情况下又尽量不打扰笔者。同时也感谢协助过我的同学，他们经常给予笔者有用的建议、提供电子书、提供心灵上的安慰和等。最后，笔者也要谢谢学校图书馆提供了各种不同种类的书，虽然图书馆系统经常出问题，但这并不影响笔者待在图书馆翻阅资料的乐趣。

谢谢大家从基础班到学士班，这四年的陪伴。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2
第三节 论文构思	4
第二章 从《三国志》到《三国志注》的《吴主传》	6
第一节 陈寿《三国志》与《吴主传》	6
第二节 裴松之《三国志注》与《吴主传》	8
第三章 孙权的前中期	11
第一节 合肥之战	11
第二节 夷陵之战	16

第四章 孙权的中晚期·····	23
第一节 航海辽东·····	23
第二节 二宫之争·····	28
结语·····	35
参考文献·····	36

第一章 绪论

孙权乃三国时其中一位霸主，其生平被收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陈寿对孙权的评价却不如刘备和曹操优待，陈寿评刘备和曹操时，皆为褒义，但评孙权时却有褒贬的现象。陈寿死后一百三十年左右，东晋宋文帝认为《三国志》过于简洁，故此命裴松之为其作注，裴注与经典注释有所不同，前者为注史，后者为注经，钱大昕曾在《三国志辨疑》区分二者，其曰注经以明理为宗，注史以达事为主（徐蜀，2004：13）。钱氏所提的“达事”指对历史记载进行补充以便更接近历史真相。裴的补阙建立于陈的记载之上，以直接、遗漏、备异的三种方式补充三国史料，其次经过自己的酝酿对史事有所看法。后人赞扬孙权称帝前的作为，称帝后却被后人冠上“昏庸”一词，这些皆受到陈、裴记载的影响。本文将陈书称陈寿《三国志》，以裴注称裴松之《三国志注》。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注释学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经学中的《周礼》有郑玄作注，《孟子》有赵岐作注，史学中《史记》有裴驷作注，《汉书》有颜师古作注，《三国志》则有裴松之作注。汉武帝表彰六经起，兴起“经注”，即

各家在传授经典之时不同的解释。史学一开始是依附于经学的一部分，注释史学等同于注释经学，因此要遵守经学的规范，主要是训诂和达理。一直到西晋的《晋中经新簿》开始将众书分为甲、乙、丙、丁，自此史学的地位脱颖而出。史学离开了经学的依附后，不再依循注经的规范而展开了新的发展。裴注便是打破注经学规范的人，除去补阙，再带有个人情感的备异、惩妄、论辩融入史注中（张端龙，2004：97-100）。

裴注的《吴主传》为我们补充了大量的历史事件，也点睛了陈寿笔下的孙权形象。再者裴在补阙的过程中对孙权有所看法，而导致其自述评价又或借引他人评价孙权，甚至反驳陈寿对孙权的评价。本文探析裴注之时，也能得知裴是如何引他人之书而达到还原历史过程，并且在陈、裴记载的异同之下探讨孙权的历史形象。此外笔者对孙权生平事迹颇感兴趣，加上后人对孙权不如曹操刘备一样赞美有加，而对孙权却是褒贬皆有，这些评价是否是受到陈、裴记载的影响，也是笔者最为关注的。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三国志集解》由卢弼（1876年—1967年）集解并在1982年出版，《吴主传第二》存于此书第柒本，为陈书及裴注加以补充。卢弼以《三国志》中其他纪传本相互补充历史事件，并且集齐各家说法，引他人看法或书籍记载加以诠释，如陈书中提孙权建安八年（196年）讨伐黄祖破舟军，卢弼引《孙策传》

注“黄祖遣船军五千人帮刘动”，再引胡三省曰：“船军，即舟师也”，卢氏按：“下文有舟兵。舟军、舟兵皆今之水师也”（卢弼，2012：1887）。

主要研究孙权的有张作耀（1931年）2007年出版的《孙权传》，认为孙权的思想内涵不如曹操，但其用人之术不输与曹操，更称孙权为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军事战略家之一（张作耀，2007：2）。此书详细的记载了孙权如何保江东领土及对江南的开发，包括海外交通、经济发展等，其作书的原因在于尝试立体化孙权的象形。研究三国时期江东一代的有方北辰的《魏晋南北朝江东世家大家族述论》，其认为江南世家对孙吴的政治势力有所影响，分为前、中、后期对东吴政治带来的局面。

专注于三国史的有张大可（1940年）作《三国史》，此书又分为上编和下编，前者论三国鼎立的形成；后者论三国对峙归一天，再附上《三国志》名篇讲析和其散论三篇。当中包括分析孙氏兴起、孙权如何立国江南和《吴主传》讲析。

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著作如万绳楠（1923年-1997年）《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主要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局的变化，当中提东吴的治国之道，论述吴主对内外所采用的政策。郑欣（1933年-2010年）《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着重于论述三国时期自北朝的土地、士族、田制、人口变化。同时郑欣也论孙权的建国、对江南的开发及孙权的晚年。

期刊部分则有王永平《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建论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其分析吴国报聘辽东时期孙权的形象，论孙权因为对士大夫的压制而导致万人至辽东走向绝灭不返。施守全《重评孙权的历史

地位》以历史唯物主义论孙权在历史的地位，并且用裴注为孙权历史活动的原始材料，认为孙权开发江南有功，而不能将孙权晚年事迹概括为对孙权的评价。堪责义《建号帝王之后孙权心理变化之初探》，比较孙权称帝前后的变化，道出孙权有统一天下之志却贪上帝王的虚荣，而导致称帝后不再如前的明智。

第三节 论文构思

本文次章梳理陈、裴的作书动机。《四库全书》对裴注补阙的内容概为曰“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¹裴注的补阙可分为直接补阙和遗漏补阙，直接补阙指裴在陈书记载不够详细之处，而裴将能见的史料加以补充；遗漏补阙则指裴在陈遗漏记载之处加以补充，当中又可细分为事件与人物的补阙。直接与遗漏补阙使裴注与陈书有所异同，再加上裴注的备异、惩妄和论辩影响后人对三国志人物的看法。同时也简介《吴主传》在《三国志》与《三国志注》的变化。

本文将以文献分析及比较法探讨陈、裴记载的异同。首先将孙权称帝前后分为孙权的前中期与中晚期，这期间再选出陈、裴大量记载的事件。首先是合肥之战，第一次合肥之战到第二次为止约六年，这期间陈、裴分别为孙权刻画出东吴不愿向谁称臣，而是有割据江东之心的形象。其次，夷陵之战，本文选择探讨夷陵之战的原因在于这是孙权称帝前的一场极为重要的战争，其奠定了

¹详见《三国志·提要》，《四库全书》，11页

东吴自立为王的走向。在夷陵之战之际，孙权为了东吴的利益而游走与蜀、魏之间，经常派遣使者出使两国。吴国出使的详细记载仅见于裴注，同时在裴注中更能显现出孙权知人善用的形象。

称帝前的孙权总被人赞美，但称帝后的孙权常被后人冠上“昏庸”一词，这些主要是受到裴注的影响。称帝后的孙权一心想扩充领土，而有航海计划。在这计划中，最让人贬孙权的便是其浪费国家资源遣万人至辽东。到了晚期的孙权，更是因为其两儿子争夺皇位一事而选择废太子，陈寿对此严厉的批评，但在裴看来废太子并不是孙权最昏庸的选择。

第二章 从《三国志》到《三国志注》的《吴主传》

此章节将简介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三国志注》，论作书动机与特点。陈寿资料源于《晋书》；裴松之则源于《宋书》。其次再进一步谈《吴主传》从《三国志》到《三国志注》的变化。首先陈书的《吴主传》乃记载孙权的生平事迹，其与《武帝纪》和《先主传》做对比之下明显得知其记载内容与二者有所不同。其次裴的四大注释内容为《吴主传》增加了许多史料，包括事件前后因素、人物介绍、两书相证等。裴注对陈书的《吴主传》补阙了孙权的形象、心态、外交手段和等，

第一节 陈寿《三国志》与《吴主传》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人，蜀国遗臣。三国时期结束后，陈寿在张华提拔下被推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房玄龄，1974：2137）。陈寿曾撰写《蜀相诸葛亮集》，后来撰写魏、蜀、吴史书共六十五篇，即《三国志》。陈寿由张华荐举，但荀勖嫉恨张华便连带讨厌陈寿，陈寿后来以养老母和母亲丧事离开政治。直到元康七年（297年），陈寿病逝，

范頴上书请皇帝采录《三国志》，《三国志》才得以传世。此外，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余文章传于世。（房玄龄，1974：2138）

《三国志》乃《魏书》，《吴书》和《蜀书》并合名称。魏与吴国原已有史官记载，蜀国则由陈寿后来采集史料成书。魏国有王沈官修史《魏书》及鱼豢私撰的《魏略》，吴国则有韦昭的《吴书》。陈寿编《蜀书》后将其与二者并列。最后成书之时，《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及《吴书》十卷，全书共六十五卷。三书原是各别独立的存在，一直到北宋雕板后三书才以《三国志》并称。

《吴主传》列于《三国志》四十七卷，《吴书》第二卷。《吴书》第一卷为其父坚兄策之传，孙权在黄龙元年（229年）称帝后追封父亲为武烈皇帝，兄长为长沙桓王（陈寿，1959：1134）。坚策为开国之主，而孙权为建国之主，因此其载于二者之后。《吴主传》记孙权（182年-252年）生平事迹，记载始于孙权十五岁，卢弼考时为汉献帝建安元年（卢弼，2012：2882），终于孙权七十一岁逝世。当中的记载包括了孙权如何与蜀吴两国的交流、军事制度、诏令、战略、对人民的政策如开仓、减税、大赦和等重要记载。

孙权虽然是三国之主，但《吴主传》与《武帝纪》及《先主传》记载略有不同。如在《武帝纪》称曹操为太祖，《先主传》称刘备为先主；而《吴主传》直呼孙权。不仅仅只有称呼，就连用字也另有别意，陈寿以“崩”和“殂”指曹操刘备逝世，却以“薨”指孙权逝世，差别于前二者用于帝王逝世而“薨”则用于诸侯逝世。对于这种现象，钱大昕曰蜀志称先主而不名……吴主权斥其名，此承祚书法之别也（钱大昕，2004：295）。

当时范頔上书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房玄龄，1974：2138）后人常以“辞多劝诫”为陈寿撰写《三国志》的目的。此外，文笔简洁是陈寿撰史的特点。《三国志》之简洁，除语言简练外，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全书前后贯穿，事不重复，见于《魏书》的，则《蜀书》、《吴书》不重出，见于《蜀书》、《吴书》的也同样处理，又纪传之间，传与转之间皆不重复（杨耀坤，伍野春著，1998：102）。正因为陈书文笔简洁及事不重复，后来宋文帝才命裴松之为陈书做补注，而有《三国志注》。

第二节 裴松之《三国志注》与《吴主传》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南宋史学家。其文武双全，八岁就学通《论语》和《毛诗》，二十岁时曾拜殿中将军，后来裴松之又曾任过国子博士。尔后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沈约，1974：1701）。

裴松之作注内容记载于《三国志注表》：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

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

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陈寿，1959：1471）

补阙即在陈书缺少的内容上做补充、备异即保留同事情但有不同记载以备异、惩妄即裴考证陈书记载并发表观点、论辩即裴注考证后为陈书记载定是非对错，以上为裴注四大内容。

《吴主传》中裴注的补阙内容较多，当中又可分为人物及事件的直接补阙和遗漏补阙，此注可得知其与陈书记载之异同，同时也使孙权的形象更为凸显。如陈书所不载但裴笔记建安九年（204年）孙权杀沈友的事件便可晓得孙权早期年轻气盛的心态，当年孙权才二十二岁认定沈友终不为己用、庸臣谗言加上裴注提大会中沈有有所是非（陈寿，1959：1117）因此将其杀之，这种对孙权更为详细的描写是陈书中无法看见的。

经过笔者的统计，裴在《吴主传》中所引之书多达十八本，如《江表传》、《吴书》、《魏略》和等。《江表传》多为补充孙权更细腻的形象、《吴书》则是记载孙权对使者的运用、《魏略》则是以敌方的视角看待孙权的人物形象。最后，裴经过自己的酝酿和思考对孙权和陈的评曰做出评价，此外在《吴主传》中也通过借引他人之话来评价孙权。

《三国志注表》载“窃惟绩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陈寿，1959：1471），他以广泛的采集资料加入注释中，不仅以补阙和备异的做法符合了宋文帝命他作注一事，同时在检核各种对三国时期记载的书籍的过程中以作惩妄、论辩，为注释学开创了新体系。伍野春认为博采群书，广记调查资料的编纂思想是裴松之对史注体的创新（杨耀坤，伍野春著，1998：236）。裴为《三国志》大量的采集书籍，而造成今日中那些已亡佚之书被保留于《三国志》中，但在逯耀东看来保存史料的功绩只是裴注的意外收获，裴注的真正价值不仅于此（逯耀东，2006：246）。

第三章 孙权的前中期

本章将探讨从第一次至第二次合肥之战，约六年期间陈、裴的记载。从中得出二者记载之异同，并如何影响后世。合肥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年），主要导因是曹操得荆州再借师出有名讨伐东吴。孙权不妥协而发生赤壁之战，孙权打算乘胜追击而主动攻打合肥。当时的孙权仅二十五岁才接手兄业第八年的他，此战可属于孙权前期又持久的第一场战争。六年的合肥之战，裴注的补阙有所出入、又能得知其备异的内容并从中深刻孙权的形象。第二次合肥之战结束四年后，刘备向孙权发起进攻，即夷陵之战。孙权全力抵抗刘备，同为了避免受到魏的偷袭而向曹丕称藩，本文将探讨陈、裴如何记载魏、吴的来往，并从裴注中能得知赵咨、浩周和等使者如何帮助吴国免于魏的讨伐。

第一节 合肥之战

陈在《吴主传》中记第一次的合肥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年），第二次则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年）之后，这是一场吴、魏争夺合肥之地的战役。约六年期间曾发生过曹操夺得荆州和刘表军队、赤壁之战及曹操到濡须。本文以下表显示陈、裴记载的异同。

年份	陈书	裴注
建安十三年 (208年)	曹操得刘表军队，吴臣劝孙权投降。 ²	《江表传》记曹操获八十万军队。 ³
建安十八年 (213年)	曹操到濡须后退兵。 ⁴	《吴历》记孙权乘轻船，曹操下令不得发弓弩。 ⁵
		《魏略》记孙权乘大船，曹操下令弓弩乱发。 ⁶
建安十九年 (214年)	孙权等人被张辽所袭，越桥逃走。 ⁷	《献帝春秋》记张辽错过杀孙权的时机。 ⁸
		《江表传》记孙权得到谷利的帮助。 ⁹

表一：《吴主传》中陈、裴对合肥之战期间的记载

首先，在《吴主传》中无具体记载曹操所获刘表军队的数目，裴以《江表传》指出“八十万”为此直接补阙，也正因为这数目的军力，而导致吴臣劝孙权降迎曹操。方北辰认为曹操此举的用意，一是提醒孙权是东汉同时也是曹操的臣子，二暗示孙权所占领的领域都是非法性质的（方北辰，1991：22），孙

²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17页。

³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18页。

⁴ 同上。

⁵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19页。

⁶ 同上。

⁷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0页。

⁸ 同上。

⁹ 同上。

权若不降迎，东吴就会被八十万军队攻下。《江表传》的“八十万”配合陈书的吴臣劝降，一切看起来非常合理的发展，但在《周瑜传》陈书记曹公得刘表的水军，船步兵数十万（陈寿，1959：1261）。此外，陈在《诸葛恪传》又记诸葛恪曾撰文提过“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陈寿，1959：1436）。

从《周瑜传》和《诸葛恪传》得知曹操得荆州时，荆州只有十万军力。依诸葛恪说法曹操最初率三十万军力来荆州，就算再得到荆州十万军力后，不过四十万军力，这与裴注所提曹操有“八十万众”的记载有所出入。至于《武帝纪》中则无记载昔日曹操进军荆州前后的军力，但《资治通鉴》¹⁰和《郝氏续后汉书》¹¹以裴注的曹操有八十万水军为主。晋朝起以魏为正统政权，有二原因，一晋续魏，二曹丕以禅让的理由继承汉朝。本文认为此后的朝代一贯如此，因此后人在编三国史时会选择性壮大魏以达制蜀、吴之视角，所以才选择收入裴注的八十万水军记载。

当时吴国上下只有周瑜、鲁肃和孙权认为应该抗曹，因此联手刘备在赤壁上与曹军相遇，大破曹军，此乃闻名的赤壁之战。曹操赤壁战败后撤回北边，留下曹仁等人在江陵，周瑜被遣攻打江陵，孙权则亲自带军攻合肥，打算左右包抄并吞曹操部分的领土。这可反映出孙权想要独据江北要地的决心，其想通过合肥之战开拓合肥东、西、北之地，若成功夺合肥，魏的徐、豫等地将会受到吴的威胁（王延武，2011：149）。吴魏双方在江陵对持约一年后，曹仁弃城逃走，但孙权在合肥一个月多都未攻下便撤退了，第一次合肥之战结束。

¹⁰ 详见司马迁《资治通鉴》，2089页

¹¹ 详见《郝氏续后汉书》卷五十，《四库全书》，445页。以蜀国为正统，置刘备和刘禅为帝纪一和二，魏、吴则列于载纪。本文推断其同样收入裴注的八十万为达魏制蜀的目的。

这期间因孙权不肯投降而导致曹操欲攻打吴国。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打濡须时，陈书只记载了曹操感叹孙权军队齐肃所以就退兵了。裴注引了两部记载此事过程的书，裴先引

《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彻军还。（陈寿，1959：1119）

随后再引《魏略》曰“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迴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陈寿，1959：1119）。濡须一战对孙权极为重要，一振奋士气，二得十余万民（张作耀，2007：166）。以上能得知主动权在孙权手上，但从两者记载可看出有所不同，《吴历》记孙权以一艘轻船来观曹军，而曹操下令不得妄发弓弩；《魏略》却记孙权以一艘大船来观曹军，曹操下令弓弩乱发，最后孙权箭均船平再回去。两者记载显然有所不同，而这种记载方式被裴称为“备异”，备异的注释方法在裴注来说是

指同一事物，各家记载有所不同，又或相反，而裴无法定判断，因此皆载，以备参考。陈寅恪认为裴注中的“备异”是受到合本子注影响（陈寅恪，2009：161），合本子注即魏晋时期释氏译经说经，注释时收入众家不同的记载¹²。

隔年建安十九年，孙权又带军征合肥，引发第二次的合肥之战，但两次的征合肥依旧失败了。陈记孙权撤兵时兵皆就路，一行人在逍遥津北边被魏将张辽所袭，最后孙权在部下的保护下才得以乘马越津桥逃走。但往后曹操又攻打东吴领地，一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同意孙权的归降才停止对东吴的攻打。

在第二次的合肥之战，裴注补阙了张辽袭孙权等人的细节以及孙权在谷利的帮助下安全逃走一事，前者为直接补阙，后者为遗漏补阙。《献帝春秋》载张辽几次与孙权相遇，张辽不识此人而让孙权顺利逃走，张辽逮到吴人一问才得知自己错过了杀孙权的机会而感到后悔。张辽问吴人紫髯将军是何人，髯指胡子之意，裴却以“紫”称孙权的面貌。除了增加孙权的神秘色彩以外，“紫”是帝王所崇尚之色，如顾江萍曾提过古代帝王对紫色有所偏爱，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紫色更是权贵的象征（顾江萍，2006：68）。此时汉未亡，孙权也未称帝，但是裴注已经形容孙权拥有帝王面相了。

其次本文论裴注的谷利乃遗漏补阙，因为谷利在《三国志》中无传，但曾在孙权的人生中起到两次的关键性作用，皆被裴注于《吴主传》中。第一次是孙权撤兵被张辽军队偷袭，陈仅记孙权骑马越桥而去，吕思勉称此乃孙权生平

¹² 也有学者认为裴注与合本子注毫无关系，如周一良认为注释佛经是将各家注释有别的并列起来做对比，而裴注多为补遗订误，并非字句出入，所以裴注恐怕与佛家的合本子注毫无渊源（周一良，1991：91）。胡赞同周一良先生的质疑，认为裴注乃补遗订误为主，与合本子注没关系（胡宝国，2003：80）。

最危险之一役（吕思勉，2008：122），陈却无更详细记载孙权在险境下到底是如何逃走的。因此，裴引《江表传》曰孙权骑马逃到了津桥但因桥已毁而无法渡桥，这时谷利在马后要求孙权抓紧马鞍，而其在马后加鞭以助马势（陈寿，1959：1120），果然马便越过了桥而孙权也因此捡回了一条命，此乃裴第一次为谷利补阙事迹。

第二次则是黄武五年（226年）孙权试新制的船时遇到大风，孙权认为应该将船开到罗州，谷利却在旁拔刀下令将船驶到樊口否则就将舵手杀掉，船成功抵达樊口时风势猛烈得船无法控制（陈寿，1959：1133）。谷利不惜抗命仅仅认为应该保全孙权的性命，而不是让其冒险乘坐着有机会翻覆的船。孙权两次处于危在旦夕之时都得到谷利的帮助，陈书对此毫无提及，因此裴注补上相关的记录。同时通过裴注得知，从第二次合肥之战后一直到黄武五年约十二年间，孙权常把谷利带在身边，裴注衬托出当时吴国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孙权爱惜武将的形象。

第二节 夷陵之战

孙权称帝前为了吴国的利益和生存，经常游走于蜀魏两国之间，上文提过的赤壁之战是吴、蜀联手抗魏，而夷陵之战则是吴、蜀交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讨伐并杀死关羽等人，刘备于彰武元年七月（221年）即吴国的建安二十六年称帝后第一件事情便是为关羽报仇，其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

征（陈寿，1959：890）。此战争发生于夷陵并称为夷陵之战，一直到隔年黄武元年（222年）才结束，战争虽然仅维持了一年左右，但最值得关注的不仅仅只是哪方胜败，而是从陈、裴记载中得知孙权如何在蜀魏狭缝中得以生存。

陈、裴记载分别如下，

年份	陈书	裴注
建安二十六年（221年）	遣赵咨使魏。 ¹³	《吴书》补阙赵咨生平和建议孙权自立发展。 ¹⁴
	遣沈珩陈谢。 ¹⁵	《吴书》补阙沈珩生平和与曹丕对答。 ¹⁶
	无	《江表传》记吴臣反对曹丕贡品要求，但孙权应之。 ¹⁷
黄武元年（222年）	刘备奔走，仅以身免。 ¹⁸	《吴历》记孙权破蜀后献贡品。 ¹⁹
		《魏书》记曹丕书信孙权。 ²⁰
	曹丕提三公上奏及议者怪	《魏略》补阙魏三公上奏内容。 ²²

¹³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1页。

¹⁴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3页。

¹⁵ 同上。

¹⁶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4页。

¹⁷ 同上。

¹⁸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5页。

¹⁹ 同上。

²⁰ 同上。

	之。 ²¹	
	浩周口陈指麾。 ²³	《魏略》补阙浩周生平及孙权使浩周深信其诚心。 ²⁴
	始復通也。 ²⁵	《江表传》记孙权回复刘备书信。 ²⁶
		《吴书》补阙郑泉生平及出使蜀国。 ²⁷

表二：《吴主传》中陈、裴对夷陵之战期间的记载

陈书记刘备东征，孙权曾求合但刘备不肯答应并帅军至巫山、秭归，孙权命陆逊、朱然、潘璋等人去抵抗。孙权再转身向曹丕称藩，此举用意于防止吴国同时受到魏、蜀的攻击。孙权称藩非消极而是积极的，目的是为了麻痹魏国，以便赢得时间与蜀决战（张大可，2013：151）。

孙权称藩后，赵咨乃第一位出使魏国的使者。赵咨对吴国的贡献极大，但仅见于裴注。裴记赵咨多次出使魏国后，意识到曹丕有征吴之意，认为魏吴之间的盟约可能不能长久，因此建议孙权吴国应独立发展，孙权采之（陈寿，1959：1123）。裴注直接补阙赵咨资料的原因在于，除了陈寿记载不够详细以外，赵咨是吴国发展走向的重要角色之一。当时孙权接纳赵咨建议后，第一个举动便是改年号，“黄武”是吴国第一个年号，当时魏年号为“黄初”，蜀年

²²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6页。

²¹ 同上。

²³ 同上。

²⁴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7页。

²⁵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6页。

²⁶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9页。

²⁷ 同上。

号为“章武”，孙权似乎有意并吞魏蜀而取魏“黄”、蜀“武”，并立年号为“黄武”，从此便能观其野心之大。听取赵咨建议后，孙权曾立太子、继续假意向魏国称藩、与魏交战、断绝来往、与蜀重新结盟，直到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走向三国鼎立的局面。不仅仅有诸葛亮与鲁肃等谋士作为推手，使者赵咨也算是这局面的推手之一。

后来魏国以封侯的借口要求孙登到魏国当人质，沈珩被遣出使魏国陈谢封侯。赵咨和沈珩同样出使魏国，但在陈书中无多加记载，主要取于裴注。陈书仅载沈珩陈谢，但沈珩到魏国的主要任务是处理人质一事，陈对此却无记载，因此裴注补阙出使过程。《吴书》记曹丕问沈珩孙登是否入魏，沈珩说自己不参与朝会和宴会所以不得而知。沈珩巧妙地为吴国拖延了人质的问题，此外，其还向孙权提出整顿军队、补充军粮、善待兵将、招揽人才等的建议才能与魏抵抗。同时，裴笔记曹丕要求吴国献上珍贵的贡品，如明珠、象牙等，引起吴臣不满。孙权认为若能以珍物换取全力对付刘备，而无需担忧受到魏的袭击，乃上策之计因此应曹丕的要求。虽然魏、吴来往的详细记载仅见于裴注，但能从中得知吴国上下并非真心向魏称臣，孙权选择称藩仅仅为了可以更专注于西北的抵御。

夷陵之战到了黄武元年（222年）陆逊攻破蜀军，夷陵之战到此结束，但陈书仅用八字叙述蜀军被破后的情节。裴为此补阙两个视角。一引《吴历》记孙权将战利品献于魏，而魏国回礼其中包括魏文帝的《典论》和诗赋，二以《魏书》补充曹丕的诏书，内容为大骂刘备乃摇动江东理应被讨伐的人。从裴的两条补阙来看，此时虽然孙权尚未将孙登送到魏国当人质，但吴、魏两国依

旧保持来往之交。蜀军刚破，吴军未来得及整顿，加上人质一事依旧无下落，孙权刚送走了蜀却又引来了魏国讨伐。

此时，由于孙登尚未到魏国当人质，使魏国有所不满。陈书记曹丕谴责孙权的书信中提到魏三公上奏并且“议者怪之”后来又有浩周曾替孙权说好话（陈寿，1959：1126），裴直接补阙详细的内容和过程。

裴注记魏三公上奏的内容，要求曹丕讨伐孙权，甚至指出孙权并不是真心效忠于魏，并说昔日九黎乱德，项羽有十罪，孙权则有十五罪，魏必须进军讨伐，但裴因其十五条文多不载（陈寿，1959：1127）而使后世无法得知十五条文的详情。从裴注得知，魏臣将孙权比喻为九黎和项羽，甚至比项羽的罪来得多。关于九黎的最早记载见于《国语》，“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徐元诰，2002：514）。传说九黎是一个以蚩尤为首的部落，因为乱德而导致社会问题最后被炎帝和黄帝打败。其次楚汉之争，刘邦胜而有汉朝也被歌颂，作为败者的项羽则被汉朝唾弃。三国继承汉，魏三公上奏要讨伐孙权时提及项羽的十条罪，此乃当初刘邦指出项羽的不忠不义之罪，之后就被项羽埋伏而中箭重伤。魏三公指责孙权有十五罪，比项羽更多，更应该被讨伐否则将来会成为魏国的威胁。从裴注得知，魏臣视孙权如同历史中被唾弃的历史人物，魏臣谈华夏之祖再到汉高祖的经历，铺叙其认为孙权不但不忠不义更会在将来让魏国陷入危机因此执意讨伐吴国。

裴注更加深孙权的险境，吴国面对的不仅仅是“议者怪之”那么简单，而是将被魏灭国的威胁。魏臣们也并非一面倒的支持曹丕讨伐孙权，一位叫浩周的魏国使者，但若只看陈书记载便无法得知为何浩周作为魏臣会替孙权说话。

裴注的内容包括孙权诉说孙登年幼未婚，加上要让孙登受礼义之教才适合到魏受封。接着又说十二月便会派遣孙登到魏国，孙权以这些为理由说服浩周，吴国是诚心与魏国结盟，这导致浩周深信不疑。回国后也一直说服曹丕无须举兵征吴。浩周无形中为吴国解除了被袭的忧患，而“人质”的问题也成功被拖延一直到吴国撑过了夷陵之战。由于浩周的原因导致曹丕一直未能讨伐吴国，最后吴、蜀谈和再与魏决裂，日本学者金文京因此称浩周为“不称职的外交官”（金文京，2014：167）。

十二月，陈书载孙权派郑泉拜见刘备并表示恢复友好，到了隔年吴、魏的来往正式结束。吴、蜀两国在夷陵之战后恢复通好关系，《江表传》载孙权书信刘备“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陈寿，1959：1129），从此能得知孙权不再认同魏代汉的正统性。当时由郑泉出使蜀国，裴笔记郑泉拥有直率的性格，即便在众人面前也可做到直谏孙权。刘备问郑泉，孙权为何不回复其书信，郑泉答刘备急于称帝有负天下人的期望所以孙权才未有回信，刘备惭愧。后来吴、蜀才恢复了书信来往。从夷陵之战到吴、蜀通好的时间非常短促，郑泉在两国的过渡期中扮演了关键性的人物才使得两国恢复关系。两国先是敌对的关系，突然就联盟了，当中是哪方先求和的问题若看陈书，记权遣郑泉聘刘备。但从裴注能得知孙权先得到刘备书信才回信，其次郑泉到蜀前，孙权已收到求和的书信。裴松之引《江表传》和《吴书》两条史料，明显含有澄清史实之用意（方北辰，1989：111）

从赵咨、沈珩到郑泉同样是使者的身份，裴松之皆从《吴书》得到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对孙权的贡献。同时，裴注中的赵咨、沈珩不是博闻多识，应对辩捷（陈寿，1959:1123）就是有智谋，能专对（陈寿，1959：1124），而出使蜀

国的郑泉虽博学有奇志却嗜酒（陈寿，1959：1129）。从中能得知孙权有意将善于对答的知识分子遣到魏国，就如赵咨以《管子》之语与曹丕对答，沈珩则善《春秋》内、外传，两者就是为了符合魏国的建安文学风气以便取得曹丕的信任。至于蜀国并不盛行文学风气，但更看重军事，因此孙权将性格直率的郑泉派到蜀国。其次在裴注中能得知赵咨和沈珩到魏国时是被曹丕压迫的，但到了郑泉出使蜀国是一种可有商量余地的地位。夷陵之战从开始到结束，裴注中吴国使者的表现能让我们得知吴国从向魏称藩以上下之分到与蜀平起平坐的联盟地位之差。张大可称孙权是一流的外交家，可以在不失东吴的前提下，灵活的外交策略，在历史关头中做出的决定而导致三国鼎立的局面（张大可，2013：149）。裴注到此任然是以补充陈书的内容为主，直到孙权的中晚期起，裴开始以自己的看法对待历史事件。

第四章 孙权的中晚期

本文将陵之战后的记载列为孙权的中晚期，夷陵之战结束时孙权已经四十岁，此战奠定了孙权东吴的地位，一直到其称帝时已四十八岁。孙权七十一岁逝世前，《吴主传》中辽东的记载最为值得关注，因此本文将孙权航海辽东的计划列于孙权的中晚期。最后，孙权晚年时发生二宫之争而选择废太子，这引起陈、裴不同的评价，陈批评孙权乃亡国之人，但裴反驳陈对孙权的评价。本文将通过二宫之争探析裴松之如何看待陈寿的评价，是否一味的反驳，又或有认可陈的某些评价。裴不再如前文，以补阙和备异补充陈书内容，而是将个人看法融入历史事件中。

第一节 航海辽东

夷陵之战后，最值得关注的是陈、裴同时拥有孙权派人航海至辽东的记录。从前文提过裴注谷利事件中能得知孙权正在制新船，笔者推断其目的除了用于打战以外还打算利用海路与魏、蜀以外的国家进行结盟。金文京也指出孙权的计划是在西边与蜀、北边与公孙氏同盟，然后从南、北、西三方对魏进行围攻

（金文京，2014：152）。下表显示陈书中孙权称帝后五次航海的记录，而裴注对孙权航海的记载始于嘉禾二年。

年份	陈书	裴注
黄武元年 (229年)	五月，派张刚、管笃出使辽东，未果。 ²⁸	无
黄龙二年 (230年)	一月，孙权又派人航海到夷洲 ²⁹ 和亶洲。 ³⁰	无
嘉禾元年 (232年)	三月，航海出使辽东。十二月辽东向孙权称藩。 ³¹	无
嘉禾二年 (233年)	三月，孙权遣万人至辽东，公孙渊杀吴使者献于魏。 ³²	《江表传》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 ³³
		裴评价万人至辽东一事。 ³⁴
		《江表传》孙权称公孙渊为鼠子。 ³⁵
		《吴书》秦旦、张羣意外到

²⁸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34页。

²⁹ 夷洲今台湾，见于《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1996：3-4）。

³⁰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36页。

³¹ 同上。

³²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38页。

³³ 同上。

³⁴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39页。

³⁵ 同上。

		高句丽。 ³⁶
赤乌二年 (239年)	三月，其派遣孙怡等人到辽东袭退并俘获魏将兵。 ³⁷	《文士传》郑胄抵达辽东时，已被魏所破。 ³⁸

表三：《吴主传》中陈、裴对孙权航海的记载

孙权的航海计划在第一次到辽东，虽然未果，却未放弃其海路计划。第二次航海记录，陈书记孙权派人航海到夷洲和亶洲。这被认为是中国和台湾经济文化交流的最早历史记载（施守全，1981：30）。

笔者大胆假设到夷洲和亶洲有两个原因，一如史料记载的其为寻长生不死之药，二为了寻找新结盟。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能得知吴国的北上属于魏国领地，辽东位于魏的东北方向，要与辽东结盟并不能通过陆地抵达，换句话说孙权若要与辽东结盟只能通过海路实践。在第一次航海辽东未果后，孙权决定往反方向航海——东南的海路寻找新的结盟。孙权无法在陆上发展而开始倾向在海上寻求结盟的原因是，当时北上的魏国已经巩固下来，国大土大军力多；西边的蜀国虽然领土较小，但那时期的诸葛亮已南征。孙权敌不过魏，与蜀又是盟友的状况下，要增强吴国势力唯有把脑筋动到海路计划上。但第二次航海也不如意，直到第三次航海总算有点结果。第四次便遣万人到辽东，公孙渊却杀了吴国使者献于魏，航海之路又告一段落。

公孙渊原是魏国封的辽东太守，后来向孙权称藩，孙权封其为燕王。公孙渊一下子从太守的身份被升到燕王，担心自己会引来魏国的讨伐加上吴国离辽

³⁶ 同上。

³⁷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3页。

³⁸ 同上。

东太远，若真的被魏国攻打，吴国恐怕帮不上，因此其将吴国一行人斩首扣押。公孙渊突然向孙权称藩，又突然杀吴国使者的原因在于渊与吴频密来往后受到了魏的强烈压力，对渊带来一定的震撼（王永平，2004：123）所以才杀吴使者以断绝来往，公孙渊的反悔惹怒孙权，

称帝后的孙权虚荣心随日膨胀，尤其是辽东第一个向其称藩后，派出了一万人到辽东，以隆重犒赏辽东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天子威仪，而遭到辽东背叛后认为严重挫伤君威（堪责义，2017：98）。在裴注中能得知，被背叛后，孙权称公孙渊为鼠子，更说出要斩公孙渊之首抛入海中。孙权怒得想亲征辽东因为不仅是被公孙渊愚弄，更是因为他统一天下的希望突然被破灭（方北辰，1991：34）。从此能得知当时孙权不仅没有反思自己不听臣子劝告，反而迁怒于公孙渊（张大可、谭良啸主编，1992：247）因此认为若不讨伐辽东，自己则无颜面对国家，但孙权的海征辽东终被劝止。

裴对孙权航海辽东一事曾评价到“臣松以为权愎谏违众，信渊意了，非有攻伐之规，重复之虑。宣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实为无道”（陈寿，1959：1139）裴极度不认同孙权航海辽东。一，孙权不听臣子的谏言，二，认为送辽东的珍品源自于人民，兵将也源自于人民，此实在伤民之举。根据孙权过往的决定，又或整部《吴主传》来说，裴并没有对任何史事做出自述评论，唯有辽东一事给了孙权负面的评价，并冠上昏虐的形容。

自此后人对辽东一事的评价多为贬义，如孙权刚愎自用（王仲荦，1979：110）、失策、昏虐、无道从此开始（王永平，2005：86）、孙权利令智昏更徒

送使者及万人性命（张作耀，2007：313-315）、孙权好大喜功（张大可，2013：157）、帝王虚荣心膨胀（谌责义，2017：98）。本文认为后人是受到裴注的影响，而对孙权航海辽东一事赋予负面评价，原因在于陈记中孙权曾遣卫温、诸葛直带万人浮海夷洲和亶洲（陈寿，1959：1136），同样也遭到臣子的谏言。《陆逊传》载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陈寿，1959：1350），《全琮传》载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陈寿，1959：1383）。甚至一行人从夷洲和亶洲回来后，孙权以违诏无功杀了卫温、诸葛直。航海夷、亶洲甚至比遣万人到辽东还早发生，同样受到吴臣反对和损失军力，但后人却认为辽东一事乃孙权中晚期昏庸的开始，这当中的原因是裴为辽东之事赋予了自述评价。

陈书仅记万人将兵中包括张弥、许晏和贺达；裴注引《吴书》记公孙渊将一行人分别安置于辽东其他地方，当中包括秦旦、张羣、杜德和黄疆被安置在辽东北部的玄菟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能见玄菟郡的不远处便是高句丽。四人在玄菟郡呆了四十多日后，决定逃回东吴，最后秦旦和黄疆逃到了高句丽。四人在高句丽的的保护下成功回到吴国，同时高句丽向孙权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鹞鸡皮十具（陈寿，1959：1140）。

裴为吴国出使者补阙了下落同时也为孙权补上高句丽称臣的意外收获。但这场意外的收获并不长久，裴注又记隔年孙权遣谢宏等人出使高句丽，但高句丽被魏国威胁要求捉拿吴国使者，谢宏知道后，闯入高句丽宫中，捉了三十多人当人质，高句丽只好妥协，将使者们送回吴国。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陈寿，1959：1140）。此后，裴注再也无高句丽的相关记录。在陈记《吴

主传》时毫无提及高句丽，只能通过裴注得知高句丽与吴国有过来往，因此属于遗漏补阙。

公孙渊在嘉禾二年（233年）杀吴国使者并与吴国决裂，嘉禾六年（237年）自立为王，在赤乌元年（238年）六月被魏国讨伐，公孙渊向孙权求助。但根据陈书记载，孙权每年只能在三月航海辽东，孙权出兵救公孙渊时已经是赤乌二年（239年）三月的事情了。裴记孙权遣郑胄救公孙渊，但抵达时辽东已被魏所破。

陈、裴在《吴主传》中对辽东之事的记载到此为止，同时也意味着孙权的航海计划正式结束。通过航海辽东一事，能得知后人受到裴注的影响，而对孙权航海辽东之事给予贬义的评价，同时通过裴注能得知孙权与高句丽有过短暂的来往。虽然说高句丽是一场意外又短暂的收获，但若仅看无裴注的《吴主传》，我们对于孙权与高句丽之间的渊源根本一无所知。同时能明白孙权航海计划并不成功是因为魏国在旁捣局，威胁了辽东再威胁高句丽，使孙权大损兵力又灭统一的理想。

第二节 两宫之争

孙权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孙权在位期间太子原为孙登，但赤乌四年（241年）孙登病逝，隔年立孙和为太子。孙和为太子之时孙霸心有不忿，导致吴臣被分为两派，史称两宫之争，最后赤乌十三年（250年）孙权

决定废太子杀孙霸改立幼子孙亮为太子才停止这场斗争，两年后孙权逝世。本文通过此事看待陈对孙权的评价，及搜集裴对孙权的评价。

陈书	裴注
称孙权有勾践之英，善用人才，晚年多嫌疑，废太子一事导致亡国开始。 ³⁹	引孙盛批评孙权服从于魏一事。 ⁴⁰
	《傅子》比较孙策与孙权的谋略。 ⁴¹
	引孙盛批评晚年信鬼神。 ⁴²
	反驳陈寿批评孙权为亡国之主。 ⁴³

表四：《吴主传》中陈、裴对孙权的评价

首先，就如在本文第二章中提过陈寿在曹操、刘备和孙权的传中分别用上不同的写作手法，这种现象或许与陈寿身世有关。陈寿乃蜀遗臣之后为晋臣，晋的前身乃魏，从此看来陈寿与吴国毫无关系，因此在批评吴国之事时可毫无避讳。其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疑，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

³⁹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9页。

⁴⁰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3页。

⁴¹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9页。

⁴²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8页。

⁴³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9页。

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冀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陈寿，1959：1149）

比起曹操⁴⁴与刘备⁴⁵的评价更直接明了，也不如曹刘二者的全文赞美，反而是褒贬皆有。前文赞美孙权的容忍及用人之术，更以勾践形容孙权的性格，这里仅用于称赞孙权前中期，如夷陵之战之时其向魏称藩之举，用赵咨、沈珩和浩周与魏国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同时拖延魏国的人质要挟。孙权把吴国推到了顶峰时期，其游走与魏蜀之间并奠定了东吴地位，但陈认为吴国的衰弱甚至到灭亡也是孙权一手造成的。陈的后文批评孙权晚年多疑，又常常轻率出征。最后陈寿最为批评的是孙权废太子及杀孙霸一事，认为吴国走向灭亡是从此开始。

虽然陈的评价已建立起孙权的历史地位，但裴却不是抱持着全盘承认的态度。首先陈以勾践赞美孙权的忍辱之气，但裴却不那么认为。对于孙权的忍辱，裴借引孙盛之话批评孙权，

⁴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眈四州，疆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擎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陈寿，1959：55）。

⁴⁵《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陈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陈寿，1959：892）。

孙盛曰“昔伯夷、叔齐不屈有周，鲁仲连不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犹义不辱，况列国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节，或臣或否乎？余观吴、蜀，咸称奉汉，至於汉代，莫能固秉臣节，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於大国也。向使权从羣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陈寿，1959：1123）

孙盛批评孙权服从于魏一事，认为孙权应像伯夷他们一样，为汉代忠臣而非向魏称藩，有违作为汉将的礼节。孙权称藩之时，众臣认为吴与魏是同等地位不应该受到魏的奉封，对吴国来说是一种耻辱，裴也认同这种状况因此引孙盛这番话评价孙权的决定。

其次，裴承认孙权的才能，其以傅玄撰《傅子》评价孙权的一生。通过与孙策的比较，带出孙权建国的才能。

《傅子》曰：孙策为人明果独断，勇盖天下，以父坚战死，少而合其兵将以报讎，转鬪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及权继其业，有张子布以为腹心，有陆议、诸葛瑾、步骖以为股肱，有吕范、朱然以为爪牙，分任授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陈寿，1959：1149）

其论吴国的建国基础，孙策为开国之主，孙权为建国之主，同时还将两者做比较。其曰孙策以兵将为父亲报仇，诛杀江南名豪；孙权以用人之术安定江南，亲近及给予官职如张子布即张昭、陆议等人。孙权与孙策的差别在于孙权可以“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权不如孙策以兵将到处镇压，反而是以官职安抚江南之人。同时“乘间伺隙”几乎论述了孙权的建国之路，其在蜀、魏之间的游走，在最佳时机做出最有利于吴国的选择，造就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再者陈批评晚年的孙权多疑又轻率，陈书记废太子杀孙霸后开始信鬼神。孙权在位五十多年也仅建过一次宫殿，即太初宫。裴注记建太初宫的原因是原本的宫殿已陈旧恐不堪用。孙权却在太元元年（251年）浪费资源及人民为一位名为王表的神人建宅送酒食，因信鬼神而引孙盛之话批评此事。

孙盛曰“盛闻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权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适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陈寿，1959：1148）

孙权晚年时不如前的用人之术，还开始信神鬼浪费国家资源，糊涂至极。本文认为孙权信鬼神的源头在其派万人航海到夷洲和亶洲找仙药，一直到晚年开始认为地震和白虎⁴⁶的出现都是天对其做出某种警告，甚至相信“神人”的话。再者孙权在位之际共有六个年号，分别为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太元、神

⁴⁶ 陈寿记赤乌十一年（248年），吴国连续地震，下冰雹和出现白虎，孙权认为这是天对他及吴国臣子们做出一种警告，要臣子做好本分帮助君王巩固国家地位（陈寿，1959：1147）

凤，堪责义认为国号的趋势从国计民生转向迷信，赤乌以后的年号不再有政治进取意义（堪责义，2017：99）。孙权这些信鬼神的举动，引得孙盛评孙权“老志衰”。

最后裴针对陈评价孙权为亡国之人做出反驳，裴曰

臣松之以为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皓。若权不废和，皓为世适，终至灭亡，有何异哉？此则衰国由于昏虐，不在于废黜也。设使亮保国祚，休不早死，则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则吴不亡矣（陈寿，1959：1149）

裴认为孙权废太子并不是直接导致吴国的灭亡，真正的原因在于孙皓的暴虐。孙皓乃孙和之子，陈书记皓继位后羸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陈寿，1959：1163），加上其滥杀吴国臣子才导致吴国政治根基动摇而灭亡。裴认为若孙权不废太子孙和，吴国大权最终还是落于孙皓手中，只有不落在孙皓手上，吴国便不会灭亡。在此之前的裴注几乎都是为了补阙陈书所缺的史事，但此注有所不同。其对陈的评价发表观点，认为吴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并非孙权而是孙皓，此符合裴注的惩妄；再则其一步一步的推论，进一步说明陈的错误评价，裴曰若当初孙权不废孙和，吴国最终还是由孙皓接手，此乃裴注的论辩。

综上所述，本文搜集了《吴主传》中裴松之对孙权的评价，探讨裴松之如何回应陈寿对孙权的评价。陈赞扬孙权忍辱之气；裴却不以为然，但对于善用

人才方面，陈裴同时赞许的。此外，陈指斥孙权晚年的多疑轻率，裴以信鬼神一事论证此事，最后陈指出孙权晚年的个性是吴国灭亡的预兆；裴却以推论的方式反驳陈寿的观点。孙权称帝前，裴注以补充史事为主，本文尽其所能的考证陈、裴记载的异同。称帝后，能从裴注中看见其注释已经加入了个人的看法，除了重新塑造孙权的历史形象同时也论证着陈对孙权的评价。

结语

综上所述，在合肥之战中后世为了达到美化曹操的目的而收裴注的八十万军力记载。合肥之战期间，裴因无法判断两书不同的记载所以皆收入，后人称之为“合本之注”。第二次合肥之战结束后，裴为一位叫谷利的武将补阙的生平事迹及对孙权的作用。其次，从陈、裴记载中能得知孙权在夷陵之战时的策略。在两者相较之下，裴注更为详细。尤其是在孙权用人之术的形象刻画，从裴注中能总结出孙权刻意将善于对答的知识分子出使到魏国，而蜀国则不然。中晚期后的孙权，因为辽东一事而被世人称为昏庸的开始，但在其航海辽东之前也发生过相似的事件，却未获得任何评价。这一切因为裴松之为航海辽东之事赋予了自述评价，导致后人深受影响。孙权晚期时，遇上了两儿子为争皇位而决定废太子杀儿子，此举受到陈寿严厉的批评。陈寿除了批评孙权以外，也赞美了孙权忍辱的性格，但在裴松之看来并非如此。裴以自己的判断看待陈寿对孙权的评价，有认同之处也有否定之处。陈寿的记载，配合上裴松之作注的四个原则，为孙权定下了历史形象。

本文认为除了孙权以外，其他三国人物的形象也受到裴注的影响，未来尚可发展此视角。又或探讨从晋朝至近代孙权的形象的变化，又或同一个朝代中对孙权所有褒贬的原因。“三国”命题的学术可涉及到史学、文学、思想和等，范围极为广阔同时也充满着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一、书籍

陈寿编、裴松之注（1959），《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

陈寅恪（2009），〈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方北辰（1991），《魏晋南北朝江东世家大族论述》，台北：文津出版社。

房玄龄（1974），《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胡宝国（2003），〈裴松之《三国志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

虎黎（1999），《魏晋南北朝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

纪昀（1987），〈三国志提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纪昀（1987），元郝：《郝氏续后汉书》，《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文京著，何晓毅、梁蕾译（2014），《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桂林：广西大学出版社。

卢弼（2012），《三国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吕思勉（2008），《吕思勉讲三国》，北京：九州出版社。

逯耀东（2006），《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

- 钱大昕（2004），《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沈约（1974），《宋书》，北京：中华书局。
- 司马光编、胡三省注（195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
- 谭其骧（1996），《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中国地图出版社。
- 万绳楠（1983），《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王永平（2005），《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仲荦（1979），《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徐蜀（2004），钱大昕：《三国志辨疑》，《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徐元诰撰，王树岷、沈长云点校（2005），《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 杨耀坤、伍野春著（1998），《陈寿、裴松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大可（2013），《三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大可、谭良啸主编（1992），《三国人物评传》，台北：水牛出版社。
- 张作耀（2007），《孙权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 郑欣（1989），《魏晋南北朝史探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周一良（1991），〈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期刊

方北辰（1989），〈蜀吴夷陵之战后议和史事考〉，《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页110-111。

顾江萍（2006），〈试论紫色在中日两国文化中象征意义的异同〉，《汉字文化》，2006年第6期，页67-69。

堪贵义（2017），〈建号帝王之后孙权心理变化之初探〉，《黑河学刊》，2017年第6期，页97-99。

施守全（1981），〈重评孙权的历史地位〉，《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页28-23。

王延武（2011），〈孙权北击合肥的历史作用——吴、魏前期战事评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页148-153。

王永平（2004），〈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建论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页121-125。

张瑞龙（2004），〈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页95-102。

